

东北大学八十周年校庆丛书



*Books Dedicated to the 80th Anniversary of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Understanding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 感悟东大



主编 孙雷



NEUPRESS  
东北大学出版社

# 回眸沧桑岁月

## 宁恩承

我是学经济财政银行专业的学生，从来没想到办教育。1929年，当张学良将军提议令我去办东北大学时，很是意外，我力陈不合承担此重大任务。但张少帅述及东北大学的形势，坦言了对我的信任，使我深感责无旁贷，只好承担。

承担下管理东北大学的责任，我立即去天津向南开张伯苓先生请教如何承办一个大学。当我叙明来意，并说明我的困难和短处后，张先生说：“处世之道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人承担责任，为人解决问题。士为知己者死，不可顾虑自己，而且办事的成功与不成功，一大半由于咱们的用心和努力，只要咱存心良善，努力去作，不会有什么错误。”经张伯苓先生这样教导，我自然坚定了办好东北大学的信心。

我到东大第一叫响的事，是东大电灯费由每月3000元减到1000元，而且电灯加多了。供应全校师生用水的自来水塔也由原来的每小时出水10000加仑增加到30000加仑。事务上的成功是人人能见到的事，东北大学的校容半年之内大为改观，东大师生皆大欢喜，齐声叫好。

20世纪30年代是东北大学鼎盛之期。学生3000人，教授300人，经费每年160万元，乃全国大学中最多者也。校园大于沈阳旧城，巍然壮观，弦歌不辍。东大之盛，在当时可与任何其他大学相比。“九一八”事变后，日军霸占东北，东北大学随之沦亡，我参加了东大鼎盛时期，也遭逢了东大流亡之困境。

1931年10月初，我到北京，已是满城风雨，学生请愿高呼抗敌，北京不再是原来的状况了。我未到北京以前已有好几百学生逃难先到了北京，分别暂住彰仪门的国货陈列馆，及东城南兵马司原税务处官房和西直门里原陆军大学旧址，分散三处。这些学生无衣无食，艰苦万分。由极辉煌大学生变成流亡难民，处处辛酸，步步艰苦，张少帅虽然仍在当政，可是前方军务紧

急，今天丢了两个县，明日哈尔滨被占了。东北大学的困难是较小轻微的事。不可扰乱张少帅军国大事，一切困难问题由我独撑，自己想法解决。好在国难当头，学生们义愤填膺，许多人讲杀敌救国，对于饥寒交迫，他们全可忍受，他们的热血可抵抗饥寒。他们和我彼此体贴，彼此谅解，所谓同安乐难，共患难易，在这次流亡中，得一证明。一部分学生组织义勇军，在彰仪门宿舍每日操练，以刘德邻、于学恩、关印忱等为首。另有出关深入敌后的学生，如张德厚、张雅轩等往返关里关外，原留在东大未进关的义勇军领袖，如苗可秀、赵同等学生，与在校学生通气，做抗敌工作，全是安定校中情绪的因素。

冯庸大学学生到北京者一律收容成为东北大学学生。锦州交通大学两班学生一百多人和十几位教授群龙无首，无家可归，彷徨无路之中来见我，请求收容。我立即把这两班学生和十几位先生收为东北大学之一部，并设法安置学生、先生们。他们得到栖身之所，皆大欢喜。这两班学生1932年毕业于在各公路及各铁路任职，抗日战争期间，我到内地各处，每有人上前招呼，口称“宁老师”，他说他是交通大学的学生，他乡遇故知，彼此欣慰，广结善缘，是一生中大快事。

流亡困苦之中，要有一些应急之方应付环境。“需要是发明之母。”为求学生安身，继续求学，我发明了“借读”方法。东大在流亡之中，支离破碎，设备奇缺，图书不全，教授不齐，不得不借重他山之石，因此，向北大、清华、南开等未受战祸的大学借读。所谓“借读”，是请求他们收容我校一部分学生，遵守各校规章，但不经入学考试。他们仍算东北大学学生，由东北大学发给毕业证书，只是免除入学考试。如果要经入学考试，有些学生就不可能入校了。这种协议，由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三校长同意，一部分东北大学学生就转入北大、清华、南开了，他们多能随班及格在三校毕业，未经东大发文凭。

一部分学生送到南京军校和浙江笕桥空军学校，空军学校和军官学校均不要学费，适于流亡学生没饭吃，拿不出学费的环境。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第一次飞临日本东京的飞将军童彦博和胜利后东北行辕情报首脑章大光即是我资助去南京投笔从戎的学生。当时，我给他两人每人10元火车票钱，漂母饭信，一饭千金，这两人永生对我如父如兄永远感激。

农学院学生到北京者20人，如何安置是一大问题。中国有农学专业的大学很少，南京金陵大学有农学院，那是教会学校，不接受我们的学生。河南开封有一农学院，屡经洽商，开封农学院把我们这批学生接纳了。当即决定送他们到河南开封，临行时，只有14人，他们行前会同来见我辞行。他们丢了家乡，来到北京，现在又流浪南行，流亡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很有依

依难舍的情感。我给他们每人10元钱，作为火车费，向他们说：“现在国难当头，我们丢了家乡，丢了学校，离开父母远去河南，我很伤感，别赋上起首两句‘春草碧色，春水绿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生离死别一向是伤心的事。现在你们无依无靠，继续流亡，一切要靠你们自己了。到河南后，务须努力用功，学成专业，将来报效国家，对人要谨慎，看看人家颜色，不可多说一句话，不可多走一步；祝福你们一路平安。”几个学生眼泪盈眶，偷偷擦干眼泪走了。几十年后，尚有一个学生提及这简单送别会，我个人也永记得这别离情景。

经我帮助，借读他校，分送军校者几十人，其他人关学生多是自寻出路，自己设法转入他校。另有一些前进分子愤于国家危亡，组织民族先锋队，加入共产党。东北大学学生在人民政府中干部政要，多是先锋队成员，参加过“一二·九”运动。

另外，东北大学资送的海外留学生12人分在英、美、德三国。东北沦陷，大学经费来源中断，他们不得不束装归国，也是我的问题。先是东北大学于1929年决定资送毕业学生成绩最优、各班考第一名者分送美、英、德三国留学。由大学资助，这群人中有金锡如、应德田、白世昌、陈克孚、赵玉昌、王际强、刘树勋、沈其巽等。我把回国旅费分别汇给他们，这些人不久就回到北京了。我把他们安置在校中，请他们帮助教学，这些人义愤填膺，热情万丈，极力要帮助母校。他们说不受薪给，实际上那是热情之下的说法，没钱吃饭，总不能饿死以后再教书，我每人每月发给生活费100元，他们极为满意，毫无怨言。东北大学流亡时代的第一、第二年很得力于这些人维持残局。后来，日久情疏，两年以后，我离开东北大学，另就河北财政特派员职，东北大学校务由王卓然主持，这批东北大学留学生就逐渐分散了。赵玉昌去了广西大学，金锡如后来担任重庆大学校长，应德田后来成了西安事变少壮派主角，各有千秋，天空任鸟飞。

王卓然主持校务三年，勉强支撑，流亡难苦中，时局动荡，办大学是不容易的，然而，学生爱国情绪高涨，许多人出关到敌后工作。1935年，由于成立半独立的华北政权，学生们极为愤慨，于12月9日游行，反对卖国，史称为“一二·九”运动。东北大学学生是主干，东北大学是“一二·九”运动的基地。

1937年1月，臧启芳做了国立东北大学校长。不久，日军发动侵华战争，华北沦陷，臧启芳在西安立足未稳。次年，东北大学就迁到四川三台了，抗日战争期间，一切困难，办大学更加困难，不言而喻。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1946年，东北大学迁回沈阳北陵校园。我由重庆

经北京回到沈阳。15年的流亡在外，飞机到沈阳上空时，“近乡情更怯”，心中极为兴奋激动。飞机降落以后，董文琦市长来接，他是来接同机好友王家祯的，顺便把我亦附在被欢迎之列了。

出机场二三里，就是东北大学的北陵校园，经过大学西门时，我请董市长、王家祯先入城，我到东北大学看看，于是他们就先走了，我一个人独入西门，沿路踽踽东行，看看我的旧居。东北春初，塞外的衰草似在微风中点头示意，好像欢迎我这远行归客，大路两旁荒无人烟，我想起诗经上关于殷商废墟的描述——“禾粟离离”。

我走了很久没见着一个人，快到校长办公楼了，灰白色的楼房依然耸立，“城郭人民半已非”。忽然，有一老工人，像是看守校园的打更的老更夫，上前来问：“先生你找谁呀？”我说：“十五年前我是这里的主人，我回来看看老地方，不找谁。”这位奉天老乡，好像没听懂我的话，他说：“主任不在，你随便看看吧。”正如唐诗中“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回到自己的家有人问我是谁，曷胜沧桑之感，我走到校长办公楼，发现大门是深锁的，我没有要求开门，仅仅由门上到门下，再由门下向门上看了两遍，摸摸门框，怅惘良久，仍继续东行。

校园的大路是三里长，由西门走到东门，再由东门走回来，经过昔日我住过的校长宿舍、教授东村、孙国封院长住宅、刘百昭院长住宅，物故人非，旧日的朋辈，多已作古了，人生的悲欢离合之情只能在心中感受，不是笔墨所能表达的。

1993年4月23日，东北大学在沈阳举行了复名典礼，群贤毕至，少长云集，参加盛典者三万余人。张学良老校长亲书“东北大学”校名，同日举行揭幕典礼，日月重光，普天同庆。

历经坎坷，东北大学终于如凤凰般再生，学生20000人，教授3000人，学习阵容已成，前途日渐光大。东北大学如能如此循序渐进，稳步发展，定能成为世界名牌大学之一，泰山北斗全世景仰，或不是我个人的狂想曲也。

**作者简介：**宁恩承，男，1901年2月生，辽宁辽中人。1922年入南开大学学习，1925年在张学良将军资助下，留学英国伦敦大学和牛津大学。曾任东北大学秘书长、代校长，为老东北大学的发展和东北大学在1992年复名做出了重大贡献。2000年2月在美国旧金山去世。身后向东北大学捐赠60万美元，用于图书馆的改造与扩建；东北大学将改建后的图书馆命名为“宁恩承图书馆”，以示永久纪念。

# 昭陵二载

马 加

我是1928年秋季考入东北大学教育学院预科的。校址在沈阳大南关下头。第二年春天，搬到了昭陵（北陵）原上，也就是东大北校。

我多么喜欢北校的校舍啊！那里有堡垒形的大礼堂、汉卿南北二楼、工学院的红楼。教育学院宿舍靠着西大门。南边是木神原农场，中间是新开河，北边挨着昭陵。每年春天来临，冰雪解冻，新开河流水潺潺，昭陵原上绿柳抽芽，云雀黄鹂在枝头上浅吟低唱；远远望去，松涛柳浪，像是大海的波涛前后呼应。

我到校的头一天，认识一位同班同学，他叫于卓（曾任高等教育出版社顾问），是从南关第一师范考进来的。他的入学考试成绩名列前茅。他不仅功课好，社会知识也很丰富，对于国家前途和社会问题，有独到的见解，显得出众不凡。至于穿戴，他是全班同学里最朴素的。他经常穿一件褪了色的青蓝布大衫，胸前别着不等边形的白山黑水图案的东大校徽，一条青细布吊腿裤子，光着头，一点也不修饰，和那些穿着西服革履的同学相比，显得有些寒伧。可是，他不卑不亢，始终保持自己的朴素作风。在同学当中，他在气质上和我有某些相同的东西，我们逐渐地熟悉起来。

可巧，我和于卓同住在教育学院红楼宿舍同一个房间。在铺床的时候，他注意到我带来一床紫蚕绸被和一床农村的麻花褥子，好奇地问我：“你从哪里来的？”我说：“兴隆店乡下。”他问：“你们那里不是涨大水了吗？”我说：“涨了大水。”他又问：“你喜欢教育这门功课吗？”“我不喜欢。”“你喜欢什么？”“我喜欢文艺。”“你喜欢文艺，为什么来学教育？”我没有立刻回答。后来他也明白了，因为到教育学院念书，要比上文学院少交20银元学费，何况文学院的教授不讲“五四”以来的新文艺作品，对新文艺采取排斥态度。

以后，我和于卓谈文艺问题渐渐地多了，感情接近，有了共同语言。

于卓的兴趣不仅仅在文艺方面，他还喜欢钻研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他常给《东方杂志》和《东三省官银号月刊》写稿，获得一些稿费。他和基督教青年会常来常往，好像进行秘密活动。他和青年会的暑期大学也有关系，时常从外边带回一些左翼文艺书籍。

“你从什么地方带回这些书籍？”我问。

于卓神秘地笑笑：“等星期天放假，我领你去那个地方。”

到了星期天，于卓领我到了沈阳督军署街，路北朝南有一家书店，门上悬块绿字牌匾，写着“绿野书店”。当时，中共满洲省委为了传播进步文化思想，开了这样一座半公开性质的书店，后来完全公开。在这荒漠的塞外古城，有了这么多文艺珍品，真算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了。我头一次体会到求知的饥渴，真有些饥不择食的样子，匆匆忙忙，买了一本于赓虞的《晨曦之前》和一本刘大杰的《渺茫的西南区》。

我读了一些文艺作品，引起我的创作欲望，开始写诗歌和短篇小说，发表在沈阳的《平民日报》、《盛京时报》、《商工日报》、《新民晚报》、《东大周刊》，上海的《春潮》和《北新》上。我发表作品最多的地方是《新民晚报》的副刊《今天》。《新民晚报》是张学良办的报纸，编辑名叫李郁阶，是一位共产党员，他曾经和何松亭、宋小坡、朱焕阶出版过一本文艺刊物，名字叫《关外》，影响很大。李郁阶主编《今天》副刊，是带着肺病工作的，为了传播革命思潮，尽量刊登一些进步文艺作品。我没有和他见过面，却常通信。我时常向他投寄一些诗稿。

通过于卓的关系，我又认识了另一位东大同学李英时，他是教育学院英文专修科的同学，却非常喜欢文艺。他是新民人，和我是同乡，为人热情、直率、博学而又和善。我们头一次见面，就谈起诗歌。我们谈到了郭沫若和殷夫的诗。他兴奋地介绍给我说：“你读过诗人柯仲平的《风火山》吗？”

我说：“没有。”

“下次我把《风火山》给你带来，它是中国一首优秀的普罗文学诗歌。”（普罗文学即无产阶级文学）

第二天，李英时匆匆地给我带来一本厚厚的《风火山》，我接来翻过两页，便被它那火热的革命诗句吸引住了。他一边把书交给我，一边向我告辞，跟随于卓走出校门。

忽然有一天，正当我们上课的时候，发生了意外的事情：当同学们打开书桌的时候，每个人都发现自己的书桌里放着一张油印传单，上面印着“中共满洲省委”字样，叠得整整齐齐。同学们都感到骇然，互相张望，唧唧喳喳。只有于卓安静地坐在凳子上，不声不响。所不同的是，他的大衫上别的

白山黑水东大校徽已经不见了。

几天以后，不知什么缘故，于卓同学不到学校里来了。就在那期间，传说有一个姓杜的共产党员，借了东大同学的校徽，冒充东大同学，参加反帝大同盟活动，当场被捕。

下学期开始，学校开课，于卓还没有来。

一天，李英时出人意料地对我说：“于卓已经到了北平，考上了北京大学。他参加许多活动，写了许多文章，非常活跃。”

他对我说，全国左翼文艺运动现在很活跃。东大附中同学李正和郭维城也办起了《冰花》。并和我商议说：“咱们也办一个文艺刊物吧！”

这个刊物的名字叫《北国》，是以东北大学同学为基础的。它的成员是：李英时、叶幻泉、林霁融、张露薇、申昌言和我，一共六个人。六个成员中，政治见解不完全一致，对于左翼文艺大都是同情的。李英时是CY（当时对共青团的称呼），他在《北国》发表一篇论文，叫做《文学与阶级》，表现出鲜明的阶级立场，公开打出普罗文学的旗帜；申昌言发表一篇论文，叫做《文学与时代》，是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解释文学作用的；我在第一期发表了一篇小说，叫做《母亲》。第一次开会是在申昌言家里，他是东大文学院的职员，这样，既便于召开会议，又便于掩护。大家讨论了办刊方针、创作、经费等问题。别的都一一解决了，只为代售刊物和通讯地址问题大伤脑筋。如果刊物地址设在东大校内，容易暴露目标。讨论半天，实在没别的办法，只得把通讯地址设在我四叔家里。

我四叔是新民乡下一个农民，从小念过两年私塾，能看《呼延庆打擂》一类的唱本。由于辽河涨大水，农村破产，他流落到沈阳，住在沙达沟贫民区，在地上摆摊卖花生。那时，一堆花生只售一个大铜板，他家里还有老婆孩子，生活非常艰难。我上东北大学的时候，和他常来常往。他相信我，他也相信我们办刊物是一件好事，愿意为我们帮忙。

有一次，我从北陵出发，经过御花园的樱桃园，到了沙达沟四叔家里。那天，四叔正生病，躺在破炕席上，脸色苍白，看见我来了，攥住我的手，仿佛有许多话要说。因为生病，他没有出去摆摊，房东要房租又催得紧。他叹息了一口气说：“穷人真没有活路呀！”

“四叔！”我怕他难过，转了话题，“有人来买刊物吗？”“有呀！”四叔喘了一口气，接着说：“来买刊物的人问这问那，也有人问你们的地址。我是一个穷庄稼人，什么也不怕，我怕有人说你们宣传赤化……”“我们是宣传真理，讲几句真话。”

第二年夏天，四叔离开沙达沟，又搬到乡下去，后来，因为少吃缺穿，



又无钱治病，在乡下去世了。

有一次，东大一位陈教授找我谈话，他原先也是搞文艺的，曾在《小说月报》发表过文章，后来到美国留学，研究教育心理学。我虽然不注意听他的讲课，他却注意到我写的作品。他和我谈话的时候，提到了我写的《在千山万岭之中》和《母亲》。东拉西扯一会儿，他把话引到正题上。

“你知道上海作家周全平吧？”

我说：“我知道，他常在上海的《现代文学》发表小说。”

“他在上海参加了左联。他想到东北来找几位文艺界的朋友接头。”陈教授把话停了停，用一种试探的眼光盯着我，问道：“你愿意和他接头吗？”“愿意。”我痛快地答应了。

后来我才知道，周全平虽然来到了东北，却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我们一直没有接头。在刘少奇同志主持中共满洲省委以后，辽宁的文艺界出现了活跃状态。文艺刊物，除了《北国》、《冰花》、《关外》，还有《夜航》、《长白山》等。作家萧军、罗慕华、王一叶等，都在辽宁报纸上发表一些文章。

第二年秋天，沈阳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北国》社的成员大都流亡到北平，其中，有半数在北平参加了左联，编辑了《文艺周报》、《文中导报》、《学风》等进步文艺刊物。在办刊物过程中，多数成员坚持革命文艺方向。

几十年过去了，每年“五一”前后，昭陵原上芳草殷殷，野花盛开，新开河水在潺潺地流动，一片大好春色，闪在眼前，想起往昔的光景，总是勾起那段难忘的回忆。

**作者简介：**马加，原名白永丰，男，1910年生，辽宁新民人。早年就学于东北大学教育系。是我国当代文学史上颇有成就的著名作家。曾任辽宁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辽宁分会主席。

# 北陵的天是蔚蓝的

林 宣

1930年7月，我怀着对东北大学万人体育场的无比向往和田径名教练步起的景仰，从老家“山一程，水一程”来到沈阳，报考坐落在北陵东新村的东大，9月入学，在建筑系第三班学习。我在东大学习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对东北大学的感情非常深厚，这里，建筑风格统一，设计精巧；这里，良师荟萃，学风淳穆。

老东大的建筑群，以北陵黑松林为背景，以红砖、绿瓦风格统一的汉卿南北楼为主体，带有国外老大学建筑的风格，除白楼外，一色由杨廷宝先生做总体设计。这些建筑个个堪称佳作，引发了我对建筑的浓厚兴趣，由此时起，我就着意建筑风格差别的研究，而且终生从事“建筑历史和理论”研究与教学工作。

在一年级的時候，我們主要開設的課程是《外建史》和《設計初步》，這兩門課程平行開設。梁思成先生講《外建史》，他教育我們“城市規劃是建築設計的延續”。他備課特別充分，從來都是脫稿講的，其特點就是話少畫多，學生們都非常喜歡聽他的課。《初步設計》是一門重頭課，建築系童寓、陳植、林徽因、梁思成四名教授全部投入到這門課程的教學中。這多名教授講授基礎課，這在建築系還是第一次，從這件事情上，就可以看出學校對學生基礎知識教學的重視程度。

梁思成先生在作建築系主任時，其教學指導思想十分明確，不但注重低年級學生基礎知識的傳授，而且注重從實戰出發，培養學生設計方案的 ability，對學生的要求也非常嚴格。在設計方式和方法上，提倡一個方案做到底。為了不讓學生凭空抄書，出題後系圖書室要關閉48小時，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和創新的能力。學生設計的圖紙經過指導教師修改後，再把它畫在一張描圖紙上，交梁思成統一保存。定案評圖時，學生要把正圖和草圖擺在一起，如果誰的圖紙不是由原來方案發展而來，再好，也只能打零分。

我们每四周完成一个小作业，交图时间固定在星期六下午。梁思成为了督促学生及时完成作业，每次交图时，他都把闹钟拨到四点整，学生们都非常紧张，但都能按时高质量地完成设计，而且养成了非常严谨的学习风气。记得有一次，题目是“风景点小茶室”，梁思成先生组有一张设计图基调太暗，梁先生让学生吹干后，调了一杯花青，浓浓地盖上一遍，再吹干，然后再用纯黄把透亮的窗和门上的亮子染成一幅夜景，堪称佳作。通过梁先生手把手为学生修改图纸，指导学生作图，我们学到了很多设计方面的技巧，也感受到了教授们严谨的作风。

梁思成先生的夫人也就是林徽因先生是我的堂姐，也是我的启蒙老师。为了让我能够学习建筑，她用成语“薪火相传”来鼓励我，我至今记忆非常深刻。她说：“‘薪火相传’可用‘薪烬火光传’来解释，火光好比一门学术，从事学术活动者生命是短暂的，贵在不断培养新一代。”当时，我还在南开中学读文科，在林徽因先生的动员下，我报考了东大建筑系。在读书期间，林徽因先生则教育我学习建筑史的“基本功在于精确断代”，引导我认真学习建筑史基础知识，奠定扎实的功底。我的终身专业是“建筑历史与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这是谨记老师的至理名言的结果。

林先生在工作中奉行“少一事不如多一事”的原则，教学上喜欢给自己加担子。为了提高学生们的外语水平，她提出增设《专业外语》课程，并主动承担教学任务。她的外语功底扎实，教学方法得当，在她的教导下，同学们的外语水平提高得很快，特别是应用能力方面有很大的长进。

林先生还特别喜欢古汉语，我们都对行文、用词感兴趣，所以我们之间就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她一眼就看出唐诗中“高频用字限于欲、但、况和独几个字”。我小时读过几年家塾，而且我在南开中学时是念文科的，诗经、唐诗、宋词都通读过一遍，比较熟悉。她总是把家中存书拿给我看，而我又成为她查阅古汉语的助手。

另外一位让我记忆非常深刻的老师就是童寓教授，他是建筑系的第二任主任（只当了三个月）。他时常教育学生“五大柱式，帮助你们树立典范，生活才是建筑创造的基础。”

关于童教授，我记忆中有一件终生难忘的事情：在“九一八”事变的第三天下午（可能是黄昏时候），我多次看见一辆挂着德国国旗的黑色汽车来回出入于已经被日本人封锁的校园，后来知道，是理工学院杨院长的德国夫人专门为教授们安排运送贵重家藏物品的。但是等到运送童先生的物品时，童先生却把所有的贵重物品丢弃了，把梁思成先生添置的一箱还没有用过的《外建史》400多片双玻璃幻灯片运送了出去，放到安全的地方保存。当时，

我们知情的学生深为童老师公而忘私的行为所感动。从童先生的身上，我不仅学习到了他的治学作风，也深为他的伟大人格所感染。所以，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一直和他保持着联系，即使到60多岁的时候，遇到难题，还时常向他请教。

“九一八”事变后，同学们都抱头痛哭，谁都不愿意离开这个美丽的校园，离开日夜生活在一起的同学，到事变后的第四天，同学们心中怀着沉痛与仇恨，被迫陆续离开了学校。我在离开学校前，把总是随身携带的最珍贵的制图仪器放在加大制图室。我当时想，童教授为了学校和事业，把自己的财产都舍弃了，没有了学校，没有了家乡，我留着这些仪器还有什么用呢？在户外久久地徘徊之后，在看了学校的每个角落，一草一木之后，离开了这里，离开了我心爱的校园。

但是我永远也无法忘记东北大学和东北大学的老师与同学。在我的印象中，北陵的天永远是蔚蓝的！

**作者简介：**林宣，男，1912年12月出生，福建福州人。1930年9月进入东北大学建筑系学习，“九一八”事变后，到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学习。1950年后，先后在沈阳工学院、东北工学院任教，1956年到西安冶金建筑学院（现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任教，教授。

## 复名前后

### 张捷迁

我1987年给郭维城先生回信时就表示：“张老校长恢复自由乃是东北大学复名的先决条件”。因此，在1990年以前，我几乎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恢复老校长自由的活动中。自台湾庆祝张学良90寿辰之后，恢复张学良自由的问题可告结束，转而探讨如何能为恢复东北大学校名而恪尽绵薄之力。

我想，张老校长本人对恢复东北大学校名的态度将会是复名能否成功的关键。张老校长的态度究竟如何，又只有与他本人直接交谈才能得知。谁有可能与之直接交谈呢？我看只有宁恩承老师和我，既有东北大学的渊源，又有可能亲自见到张老校长。这是历史赋予我的不应推卸的责任。于是，开始为恢复校名而奔走。

1991年1月22日，我与夫人首先赴台湾拜访张老校长，直接向他提询恢复校名之事，张老校长欲语又罢，始终不明确表态，而送给我一纸他亲书的《决志书》。

我理解老校长给我《决志书》是要告诉我，他虽然竭诚希望能恢复东北大学校名，但他并不愿以乞求别人怜悯而恩赐个“复名”。在我临别并告知他要到大陆调研复名问题时，他又告诉我两点：一是到大陆后，可以找找杨尚昆和邓颖超两位；二是他不久要去美国探亲，但此事切希保密。可见，张老校长在复名问题上心情是复杂的。既不愿意亲自公开表态，以免造成“乞求”的印象，但又建议我可以向国家主席杨尚昆和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建言，以使复名成功。

我于3月1日起到大陆进行调研、磋商和斡旋。调研之前，我对东北工学院、东北师范大学与原东北大学的渊源、两校实力、复名的期望等不甚了解，对各地校友会的情况亦一无所知。首程到达北京，得到东北大学北京校友会会长郭维城的热情接待，我与他商讨了复名事宜。郭维城就此事通过有关渠道向国家主席杨尚昆做了汇报。杨主席派其秘书三次到我的下榻处听取

我关于复名情况的建议。中央对台办主任杨斯德、副主任李庆州、全国政协常委杨拯民（杨虎城将军之子）三人设宴招待我，郭维城作陪。在北京逗留期间，我对复名的有关情况以及观点上的分歧有了一些了解。

4月1日，我去长春东北师范大学调研、协商，希望携起手来，与东北工学院合作，两校同时恢复东北大学，成为“沈阳”与“长春”两个分校，师大领导接受了此观点。接着，我去沈阳，到东北工学院调研、磋商。我同意东北工学院党委书记费寿林提出的减少复名阻力的三点看法：复校后学校原领导体制不变；不提出要求收回东北大学原北陵校园问题（现为辽宁省政府、辽宁省军区所在地）；东北工学院与东北师范大学是兄弟院校，在恢复东北大学校名问题上，要通力合作，第一位的是争取复名成功，至于究竟是两所学校同时复名，还是只由一所学校恢复，由中央（政府）来定，我们两个兄弟院校之间不争。4月下旬，在北京召开东北大学若干地区的校友会，庆祝东北大学校庆68周年及研讨复名事宜。东北工学院和东北师范大学两校提出恢复东北大学沈阳分校（原东北工学院）、东北大学长春分校（原东北师范大学）的上报材料。

1991年3月10日，张学良夫妇离台赴美探亲访问，当时，我正在中国大陆。5月，我经台湾返回美国。

6月1日，我参加了在纽约举行的张汉公91岁寿庆会。宁恩承先生也由美国西部赶到纽约。下午，我们两人在张学良寓处（贝祖诒遗孀蒋士云女士家）作礼节性的拜访。晚间，旅美侨界在纽约万寿宫为张学良将军庆贺91华诞。中国政府派吕正操专程赴美为老长官祝寿，并表示欢迎将军回归故里扫祭父墓和亲睹家乡面貌。此间，我和宁恩承拜会了吕正操，并请他回国后关照东大复名事宜。

1992年1月9日，我以《校友会通讯》的方式，向在美的东大校友们介绍了一年来的复名活动情况，主要提出“我们多年的梦想：如张汉公恢复自由；东北大学恢复校名；校友齐聚沈阳庆校长92寿辰。几乎都能兑现了。”我对此作了乐观的估计。

由于1991年4月26日向上呈报的复名之事迟迟未得到答复，我于1992年2月17日，以东大海外复名促进会会长和东大在美校友会会长的名义，特请中国驻美大使馆用传真方式给李铁映、李鹏、江泽民、杨尚昆、邓颖超和邓老（小平）写信，再次陈述恢复东北大学校名的意义。其中着重说明东北大学与张学良将军的关系问题。“东北大学老校长张学良先生，对中华民族赤心爱国的精诚，家喻户晓，两岸同颂。当年周总理深知实情，称张老先生为千古功臣，他的功德有代代不朽的价值。”“九一八”事变前，鉴于

强敌侵略野心，东北危急，张学良校长，捐赠巨资，延聘名师，严造人才，数年间，名闻全国。为挽救祖国东北计划的有效核心。事变后，不幸东北失守，东大学生多奋起抗敌，不顾流血捐躯。抗日战争流离困苦，东大仍努力造就才干。“恢复东北大学名义……是光大老校长创校精神，绵延发展下去”。“是贯彻‘千古功臣’有益政策，以慰海内外校友和东北人民关怀”。“本年（1992）6月1日是张校长老先生九二寿庆，幸老先生基本硬朗，东大同学会，东工和东北师大拟在沈阳，为老校长举行寿庆，宴请中外各地亲友聚首。希望东大复名消息，早日公布。届时应请老校长亲临。时间最好安排在五月下旬，在6月1日寿辰之前。”

1992年6月28日，趁我去台湾参加“中央研究院”第20次院士会议之机，拜访了张老校长，他盛情接待，长谈了一个半小时，当我谈及家乡的人民和东北大学的学子都殷切地盼望张将军能归乡看望时，他曾表示本人有此深切愿望，但先决条件是“对两岸人民有益处，双方真正合作，只对一方有益而对另一方有损之事，我不愿做，也不应当做”。

我于8月8日专访中国驻美大使朱启祯，问他能否帮助我给邓小平转呈一信？朱说：我是全权大使，此事在我职责范围内，可予转呈。在给邓老的信中，我又重新说明了“东北大学老校长张学良先生，对中华民族赤心爱国的精诚，家喻户晓，两岸同颂。当年周恩来总理称张先生为‘千古功臣’。恢复东北大学名义是当务之急，是证实老校长创校不屈不挠的精神，不忘‘九一八’国耻，意义与众不同”。“老先生风烛残年，能看到久别60年的故乡和亲友们，是他最后的愿望。希望政府能及早恢复东北大学校名，并在举行复名典礼时，请原（老）校长、现名誉校长张学良返乡剪彩，名正言顺，台湾当局无法拒绝。如遭拒绝，本同学会将恳切向台湾方面请命。”

后来事态的发展给我的印象是这封信可能起了积极作用。（另外，我在毛毛所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偶然发现邓小平在陕北曾患伤寒，在康复期间，还间接得到张学良赠奶粉的情缘。）

1992年9月15日，接到东北工学院原副院长杨佩祯的来函，让我帮助请求张学良老校长为东北大学题写校名，以为复名早做准备。我想，目前时机已近成熟，故于11月16日与张学良老校长通了电话，请他题写学校大门牌匾上的校名，获张老校长的慨诺。正好宁恩承先生于20日去台湾办事，我便托他去求张汉公办成题名之事，并请他带我去我给张学良夫妇的一封信。信中除谈到题写校名之事外，还提到明年在沈阳办三件事：庆母校建校70周年；庆老师掌校60周年；祝老师92华诞，请老师、师母亲临。

11月30日，宁恩承先生去张府，请张老校长题写“东北大学”校名，

老校长当即挥毫写就校名。

张学良老校长只题写一个统一的校名，不题两个分校的校名。张学良老校长表示同意接受复名后任东北大学“名誉校长”、“名誉董事长”等名义。我于12月6日收到了宁老先生寄来的张老校长题写的东北大学校名手迹。12月15日，我发传真给蒋仲乐、杨佩祯，寄去张老校长写的东北大学校名的题字，并建议二事：向当局请示请张学良任名誉校长；是否可请张学良参加1993年4月26日的庆祝活动。1993年1月3日，我用传真写信给李登辉，告知近来大陆当局对东北大学复名之事日趋明朗，母校复名在即，拟于1993年东北大学建校70周年之际举行复名典礼，恭请张学良亲临剪彩，希予关照协助。

1993年3月8日，国家教委正式批准东北工学院更名为东北大学。3月22日，杨佩祯、苏士权两位副校长到美国来会见宁恩承先生和我，表示感谢我俩对复名所做的工作；另一方面是委托我代表东北大学赴台湾聘请张学良担任东北大学“名誉校长”和“名誉董事长”以及恭请张学良回沈阳参加复名庆典。美国东部时间3月24日22时45分，我挂通了打给张老校长的电话，告诉他东大复名之事已被正式批准，张老校长听后，连声高兴地说：“很好，很好！”当提出请他担任“名誉校长”和“名誉董事长”两职时，他也欣然接受，慨诺：“好！好！”3月29日，我以东大在美校友会会长的名义，给东大在美校友发传真，向他们通报东大已被正式批准复名以及于本年4月22日在沈阳举行复名典礼等事项。

4月13日，我同夫人抵台，拜会老校长张学良，并代表东北大学蒋仲乐校长向他致送了“东北大学名誉校长”和“东北大学校友会名誉董事长”的聘书时，他露出欣慰的笑容，高兴地拿在手中，用高倍放大镜仔细地一字一句地看。我问张老校长“你接受聘书不？”他马上说：“我接受，我接受”。当提出邀请他们夫妇二人亲赴沈阳参加复名典礼时，张老校长表示由于身体欠佳，回沈参加复名典礼之事难以成行。但是他表示将来请宁恩承先生代表他参加复名典礼。应请求，张老校长又写了两幅题词，要我转交东北大学。

当时，我提议，于4月15日晚，请张老校长共进晚餐以庆复名成功，获慨允。4月15日晚老校长身着黑色西服，系上暗红色领带，以示隆重。晚宴并请孙运璿、吴大猷、梁肃戎、袁家骝（高能物理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吴健雄的丈夫）、刘绍唐（《传记文学》发行人）等关心和支持东大复名的重要人士共聚。席间，张老校长情绪饱满，妙语连珠，频频举杯，共祝东大校运昌隆。

4月22日，我同夫人一起参加了东北大学在沈阳辽宁体育馆举行的复名典礼。复名典礼庄严隆重、规模宏大、贵宾云集，新老校友欢欣鼓舞。名誉校长张学良先生的代表、东北大学原秘书长、代理校长宁恩承先生，在复



名典礼大会上做了讲话。我在大会上也做了发言。我们的讲话博得与会人员的热烈欢迎，情有所感，即兴作诗一首，抒怀：

### 母校史略吟

——东北大学复名成功抒怀  
 灼灼强邻目，东北痛飘摇；  
 百岁树人计，汉公建校劳。  
 变生“九一八”，校务纷如麻；  
 方庆弦歌续，传闻两分家。  
 都恋老校名，汉公题匾门；  
 校庆加剪彩，七十又重生。  
 同心齐努力，水到渠自成；  
 英才遍华夏，荣耀母校名。

1993年4月22日

东北大学复名后，在东北大学领导的建议下，经过我的安排，由台湾成功大学邀请并在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协助下，1993年11月12日至12月7日，东北大学蒋仲乐校长率代表团（团员有赫冀成、苏士权、柴天佑和才庆魁教授）一行五人，到台湾访问。11月27日，经宁恩承老师和我的引见，蒋仲乐校长一行前往台北士林区天母中山北路张老校长府第拜会了渴念良久的张学良老校长。实现新、老校长的历史性会见，这也是一次传奇性的会见。它将永载东北大学史册。

1996年6月13日，东北大学校董会正式成立。我被委以常务董事之职，深感责任重大。我将继续为东北大学的发展尽心竭力。

## 后 记

1988年成立东北大学在美校友会时，我们几位筹备者曾对“争取张学良将军恢复全面自由”成功的可能性作过估计，我是最乐观的，认为有50%的可能性；同时也对“恢复东北大学校名”成功的可能性进行估计，我也是最乐观，说再打个对折，有25%的可能性吧！而有的校友则认为“零”，提议别把恢复校名问题作为校友会的奋斗目标之一。应该说，我们是有幸者，今天，这两项目标都已实现。

有一些朋友曾问我：你在筹建东大在美校友会时已年届75岁（实际是80岁），属耆年老者了，满应该少操闲心，颐养天年，为什么又去找这种劳命丧财的事情干呢？你是一个知名学者，何必牵涉到这些政治漩涡中去呢？你的行动高尚、感人，是什么因素使你在晚年还如此奋斗呢？